

## 書 評

洪 瑩 發<sup>\*</sup>

蔡志祥、韋錦新編

### 《延續與變革：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誌》

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14 年，465 頁，ISBN 9789629965846

「建醮」是華人社會重要的儀式活動，尤其在華南社會民間信仰更是重視醮典活動，不只具有重要的宗教文化意涵，其儀式也是民間社會重要的網絡結合與展示。各種宗教儀式除具有宗教意涵外，集體性的宗教儀式更具有豐富的社會意涵，在每個區域與社群，都具有不同的意涵，也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如同本書緒論所提到社區節日是週期性的、成員集體共享的活動，節日一方面表現社會群體的凝聚和分化，另一方面是加強或分化社會群體的元素。建醮是社區性和常規性的地方社會活動，通過週期的實踐不斷強化社區成員的聯繫，定義社區的界線。(頁 xii) 書中在各區域的不同田野，透過建醮活動的民族誌，讓大家認識建醮儀式如何組成運作，以及顯示民間宗教在香港社會的網絡與象徵。

道教儀式研究在漢學研究上佔有重要的部分，不管是早期外國學者在臺

---

2015 年 7 月 22 日收稿，2015 年 12 月 25 日修訂完成，2015 年 12 月 25 日通過刊登。

\*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、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博士後。

Hung Ying-fa i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t the Academia Sinica, and at the Academia Sinica Digital Center.

灣進行的研究，或是後期在中國進行的田野，相關研究皆著重於儀式與儀式專家，較少注意儀式的社會脈絡，本書正好補足這樣的面向，著重在社會面向的記述與討論。本書依舉辦建醮及類似節日儀式活動的不同主體，分成六個章節，劃分為單姓宗族聚落、複姓聚落、單姓主導的複姓聚落、墟市、客家，及浮生與邊緣社區等六章，以不同的地方社會組織形態為主題，集中反映了社區歷史的沿革，不同群體的普通意識形態、文化價值認同及特定時空的世界觀。(頁 xvi)

第一章「新界北的單姓宗族聚落」，共收錄四篇文章，記述單姓聚落辦理儀式情形，在單姓聚落裡，醮典成為確認社區和群體的重要象徵，同時有著確認村民資格的功能，村民被納入神誕與儀式內，共同的族群與社區在儀式體現，也成為宗族權力的脈絡一部分，<sup>1</sup>顯示鄉村性的宗教活動不單是宗教信仰，更與社會組織與日常生活經驗結合，透過各種宗教活動來潔淨社區、超幽祭祖、重新確認社區範圍與成員資格。<sup>2</sup>在這些案例，儀式雖然部分對外開放，但是核心的儀式，還是只能由單性村內的宗族成員參與。

第二章談「複姓村落」的參與，記述不同的姓氏如何在醮典內合作，儀式也是確認村落成員的方式，參加祭祀作為社區成員義務。<sup>3</sup>複姓村具有開放的空間性，在現代社會不斷有人移入，常透過儀式做原居住者的識別，常常社區打醮，外人是沒有資格參加；雖然移入人口增加，醮典規模越盛大，但村內有越來越多的「外人」，需透過儀式顯示彼此的差異。<sup>4</sup>據蔡志祥〈從喃嘸師傅到道壇經生：香港的打醮和社區關係的演變〉的觀察，透過各種醮典正式的儀式文書：「意文」、「表文」、「社書」、「人緣榜」等展示差異，就算是贊助者也不能書寫在象徵社區群體的儀式文書上，就算你已經在社區居住一段時間，在社區未正式承認你的身分前，你只會出現在贊助名單中。醮典除反映社區成員身分外，也界定社區的界線與從屬，社區內的眾神（廟神、土地神、井泉神等）被請到醮棚，同時將所屬「墟市」的主神請到醮棚。(頁 99-100) 醮典也隱含反映權力結構與歷史記憶，例如卜永堅〈抗租與迎神：

1 譚思敏，〈1998 年香港上水金錢村福德大王寶誕考察報告〉，頁 39。

2 呂永昇，〈香港新界的太平清醮與太平洪朝：以上水丙崗村為例〉，頁 41。

3 蔡志祥，〈從喃嘸師傅到道壇經生：香港的打醮和社區關係的演變〉，頁 99。

4 李麗梅、鄭萃群，〈1980 年西貢蠔涌太平清醮考察報告〉，頁 143。

從己卯年（1999）香港大埔林村鄉十年一度太平清醮看清代林村與龍躍頭鄧氏之關係）提到林村與龍躍頭鄧氏的雙重關係，邀請由龍躍頭鄧氏控制的大埔墟天后宮神明，同時設置晚清對抗鄧氏收租而犧牲的「護鄉烈士神位」，前者反映林村歷史上屬於大埔墟的一分子，後者呈現對抗強勢家族的歷史記憶，呈現「既拒還迎」的尷尬位置（頁 122），隱喻權力結構，以及隱含的抵抗，都在儀式中被記憶著。瀨川昌久其研究也認為打醮反映著歷史上村落的結盟與敵對關係，而不是村落的地理距離。<sup>5</sup>

第三章「單性主導的複姓聚落：廈村鄉」，收錄四篇從 1984 到 2004 三次廈村建醮的紀錄，及一篇附屬聚落順風圍建醮的紀錄。五篇跨越近四十年的建醮記錄，其記錄與關心的重點不一，提供每次祭典的蛛絲馬跡。各篇多是醮典片面觀察，但蔡志祥〈1984 年廈村鄉太平清醮田野筆記〉一文，透過某些事務，如醮棚布置、迎神、舞龍等，觀察到某些村落具有較優越的地位。

第四章「墟市建醮：長洲」，以知名的長洲「太平清醮」為例，三篇文章剛好從三個面向討論長洲太平清醮，呈現其豐富的面向。第一篇是 1953 年 W. A. Taylor 所寫的〈幽靈的節日〉，描述當時宗教儀式與意義；第二篇蔡志祥〈族群凝聚的強化：長洲醮會〉指出醮典強化海陸豐、潮州、惠州人的族群意識，透過儀式長洲醮會整體是屬於海島上所有居民，但醮會某儀式只屬於某些居民，例如神功戲、遊神、神明位置等，長期歷史顯示長洲醮會由海陸豐單一族群的醮典，慢慢納入潮惠、廣府人，但對於水上人（蜑民）卻長期排斥，就算現代開放給非居住於此的人參加，成為香港重要的節慶觀光活動，仍將水上人排拒於外。（頁 297-308）第三篇梁寶山〈傳統再造：長洲太平清醮與「中環廟會」〉，從社會角度看醮典、經濟、觀光、地方政治權力，從儀式時間更改、搶包山儀式再造、社區環境空間等，太平清醮成為儀式（居民）與節目（政府、商家）各取所需的場域，並反省香港傳統節日「節慶化」的現象，表達「符號拼湊」下，集體的文化失意，以文化保存之名，卻割斷與當下社會文化脈絡的關聯（頁 322-332），讓我們重新思考儀式與觀光的互動。<sup>6</sup>

5 (日)瀨川昌久,〈打醮:まつりにあられる香港の村の素顔〉,《季刊民族學》33(1985): 20-35。

6 當然一個儀式並不是全往負向的發展，配合參見蔡志祥另一篇文章：〈非物質文化遺

第五章「客家安龍」。「龍」在華人社會有豐富的文化象徵，在華南社會象徵地方風水與命運的「龍脈」，本章即記述新界客家的安龍儀式與相關資料，除討論社區與安龍儀式的舉辦及意義外，並討論執行者改變造成儀式變化，但多數居民不管儀式細節或是執行者的不同，在乎的是核心儀式：「安龍」舉辦與否。而社區居民也不管在道教上儀式的真義為何，而是依據地方傳統與需求，建構出自己的意義與想像。<sup>7</sup>

第六章「浮生與邊緣社區」，第一篇馬健行〈轉變中的潔淨社區儀式：佛堂門天后誕太平清醮個案研究〉，討論儀式主辦者的變化，地方社會通過不同的方式進入醮會，並影響儀式進行，從地方神明（洪聖）進入正殿，象徵地方社會與神明躋身醮會，但從其空間使用，屬於邊緣的位置；也述及新的主辦者找新的執行者：全真道堂，不斷調適變化。（頁 415-429）韋錦新〈觀音、佛祖、朱大仙：從水面醮看香港仔的漁民信仰與組織〉，談朱大仙的水面醮典，在漁業匱乏與年輕人漸漸上岸後，所產生的變遷與調適。

本書豐富的一手現場紀錄資料，各作者提出觀察與想法，並以「延續與變革」概念貫穿全書，「延續」是指地方居民努力延續儀式的舉辦，也企圖維持宗教在社區的意義與作用，例如作為身分界定與結構社區網絡。但儀式傳統並非一成不變，尤其香港社會面臨各種劇烈的改變，在社會變遷過程中，隨社區人群的身分界線與族群關係轉變，傳統不斷地被調整和改變。面對地方社會不同訴求，作為主辦者不斷調整節日與儀式細節，許多細節被簡化，但更多創新儀式增加，文化內涵及象徵意義被重新詮釋和解读，（頁 xvii）儀式不斷的調適與「變革」。社區不斷的調適以及變化，尤其是舉辦者、執行者、儀式意義，三者也不斷改變與調適，互動與解釋出新的形式。

### 1. 參與者的改變

參與者的改變分成內在與外在，內在主導者想法與視野與以前不同，在眾多案例中社區不同人群的加入，例如開放讓居住十年以上的居民參加，或是讓年輕人進入醮會，對儀式執行者與細節安排皆有影響。除本書外，蔡志

產的傳承與保育——以長洲島的太平清醮為例〉，《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東亞地方社會》（香港：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，香港文化博物館），可以有更全面的觀察。

7 張瑞威、黎燕芬，〈三十年前的西貢井欄樹「安龍清醮」〉，頁 373-378；韋錦新，〈安龍：香港新界客家社群的節日與儀式流變〉，頁 387-403。

祥也舉出漁民積極參與岸上人的安龍儀式，原本由客家儀式專家主導，在新參與者介入後，改變儀式內容或是執行者。<sup>8</sup> 原有的儀式意義，不一定符合新的需求，開始帶來符合自己想法的改變，主導者主動影響儀式執行者，或是被動接受執行者的調整，亦或共同的調適與變化，皆是為現代需求進行的各項變革。

## 2. 儀式執行者的改變

儀式執行者最大的衝擊在於香港各式新興的道教團體成立，大量的道教學院、道經班或是道堂等儀式團體成立，影響地方道壇生態，包含正一、客家、喃嘸等各式傳統道壇。道經班與喃嘸佬最大的差異為傳統儀式執行者多是職業化的，透過儀式作為獲取收入維生；道經班則是以修練、功德、聯誼等為目的，是非職業化儀式團體，多數並不是以此為主要收入來源。醮典對經生來說，打醮的目的是祭祀、求福、博愛，是一場大功德；對於喃嘸來說，除經濟收入外，還有結識人脈、學習傳承、自我證明等作用，<sup>9</sup> 對於兩者來說，執行儀式有非常不一樣的功能。

道堂最大優勢為比道士或其他傳統儀式執行者便宜，費用差距甚大，因多數道觀有強大資源的支持，具有良好經濟基礎與仕紳網絡，不用透過主持醮會賺錢，而道觀仕紳影響力與投標制度，讓道觀順利進入地方社會主持儀式，<sup>10</sup> 在經濟與社會網絡的雙重誘因下，香港地方社會的宗教生態產生改變。另外香港道教教育的推動，除道堂的成立外，也影響一般民衆，建構某些類型道壇的「正統」性與權威性，同時影響地方道壇生態。

## 3. 儀式的詮釋變化

儀式隨著社區人群的身分界線與族群轉變，儀式傳統亦不斷的被調整，面對地方社會的各種訴求，主辦者不斷調整節日與儀式的細節。而儀式執行者改變社區建醮傳統的習俗，許多細節被簡化，加上創新的儀式，及文化內

---

8 蔡志祥，〈傳承與變遷：香港正一清醮的儀式、文本與儀式專家〉，收於蔡志祥、韋錦新、呂永昇編，《儀式與科儀：香港新界的正一清醮》（香港：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，2011），頁 23-25。

9 蔡志祥，〈從喃嘸師傅到道壇經生：香港的打醮和社區關係的演變〉，頁 115-116。

10 同上註，頁 115-116。

涵、象徵意義被加以重新詮釋與解讀。<sup>11</sup> 調適有幾個面向，一個是新的儀式者介入，儀式或是細節的改變，因社區民衆不關心細節，醮典內涵是由地方傳統與法師傳統共同建構，村民不清楚道士的儀式，但不會困惑懷疑，因為這些神秘的儀式就是打醮，只要將其重視的儀式納入，<sup>12</sup> 滿足其信仰需求即可，所以民衆不注重儀式執行者的轉變。而主辦者則隨著社區需求改變詮釋，同時受到社會氛圍與儀式執行者影響，改變地方傳統的詮釋，本書指出對於醮典意義論述的改變，從具地方性詮釋及地方意義轉向道教的「正統性」說法。而新興道堂對醮會背後的社區地域界線並不關心，關心是面對醮會的不同傳統，如何調節科儀，迎合醮會代表的需求。<sup>13</sup> 所以儀式執行者不關心地方儀式的意義，而是著重本身所傳承的科儀傳統，儀式解釋也從此出發。

隨著社會的各項變遷與地方社會的改變，新舊的儀式執行者必須主動或被動調整儀式細節，配合地方社會的儀式變遷，通過不同的話語，重塑自身的權威性，地方社會亦做出相應的調適，<sup>14</sup> 儀式詮釋隨著時代與社區需求改變，形成新的「文化傳統」。

上述三者的改變，是本書貫穿的重點，同樣議題可借鏡於臺灣道教研究，相對於其他宗教儀式，從宗教儀式、文化資產、社會網絡等多層面的研究，建醮儀式在社會性研究就顯得較少，本書剛好從民族誌提供各種面向的觀察，補充不足之處。緒論中提及香港的醮典研究，不如臺灣的醮典研究的豐富，確實臺灣對於單一醮典的紀錄，比起香港數量較多，但多著重於科儀本身的研究或是紀錄，反而較少對於社會層面的關懷。

編者蔡志祥長期關注儀式與地方社會的關係，尤其關注打醮，著有一系列討論香港「打醮」儀式與地方社會的文章與書籍，<sup>15</sup> 要理解本書內容與香港醮典與地方社會網絡，可能要連同其他書籍與文章一起閱讀，包含其他關

---

11 韋錦新，〈安龍：香港新界客家社群的節日與儀式流變〉，頁 402-403。

12 科大衛 (David Faure)，〈宗教與地域的表徵〉，陳慎慶編，《諸神嘉年華：香港宗教研究》(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02)，頁 140-160。

13 馬健行，〈轉變中的潔淨社區儀式：佛堂門天后誕太平清醮個案研究〉，頁 424。

14 韋錦新，〈安龍：香港新界客家社群的節日與儀式流變〉，頁 402-403。

15 蔡志祥，《打醮：香港的節日和地域社會》(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00)；蔡志祥、韋錦新、呂永昇主編，《儀式與科儀：香港新界的正一清醮》。

於道壇的研究，<sup>16</sup> 因為本書所涉及道壇的基礎知識較多，必須將相關資料一同參閱，才易於理解其脈絡。香港道教也有眾多研究可供參考，包含基礎的介紹與專論，在區域道教研究有豐富的成果，同樣是具有多重道教儀式傳統的臺灣，可借鏡多元面向且豐富的研究成果，尤其在整合出版的面向之上，還未有較全面性全臺灣道教的研究整合出現，是同樣擁有豐富道教生態的臺灣，可以繼續共同努力的方向。

本書以民族誌為主，其記述者所選擇關注與表達的，包含田野筆記、訪談紀錄、田野報告、專題研究，沒有一致性的收錄標準，也缺乏跨越案例的比較資料，也是因為多人共寫，以及收錄各種時代資料，一定會出現的問題。這是本書的弱點，卻同時也是一個優點，因為透過不同人的領域以及所關注的問題，開展不同面向的觀察，呈現出香港民間社會的多元面貌。不同的時代紀錄，留下豐富的時代記憶，尤其筆記與調查報告的公開出版，更嘉惠相關研究者。而在其導論即提到：閱讀者應該意識到無論多完善，民族誌是報導者通過自我選擇的過程而建構出來的紀錄，是片段的、不完整的。紀錄的揀選和記錄者的研究取向、當代的問題意識密切相關。因此，閱讀民族誌，需要閱讀者的想像來重新組合節日的活動過程，以及研究者所掘發、申引出來的社區功能和象徵意義。（頁 xiii）

---

16 關於香港新興道教團體的成立，參見（日）志賀市子著，宋軍譯，《香港道教與扶乩信仰：歷史與認同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，2013）；黎志添，《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2005）；黎志添、游子安、吳真，《香港道教：歷史源流及其現代轉型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2010）；黎志添，《廣東地方道教研究——道觀、道士及科儀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，2007）；黎志添、游子安、吳真，《香港道堂科儀歷史與傳承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2009）。

